【当代中外清史学家】

艾尔曼及其清代学术史研究

卢 汉 超

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们分成三代，① 那么，班吉明·艾尔曼（Benjamin A.Elman）属于最年青的第三代学者。艾尔曼一九八〇年毕业于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系，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休士顿的莱士大学。他现在是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思想史教授。该校在一九八六年成立中国研究中心，在黄宗智（Philip C.C.Huang）教授主持下，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中国研究计划。艾尔曼正是在这一年应聘到加州大学任教的。

他虽然年青，已是两本学术著作和许多学术论文的作者，以及一本学术论文集的编者，并是美国两份有影响的中国史研究杂志《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的编委。他的成名作《从义理学到考证学：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和思想变迁》（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g: Inte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九八四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后，不久即在台湾出现了当地印刷的平装本，这是该书受到欢迎的一个佐证。因为学术著作读者面窄、销路不广的现象是中外一律的。因此在美国等地一本学术著作的成功与否，往往看它有没有平装本出现（当然并非绝对如此）；出版商只有在书的销路较好的情况下才考虑出平装本以饷读者。台湾的书商则常常将美国、日本及欧洲声誉较好的学术著作印成廉价的平装本发售，既可获利，也有助于中外学术交流，几成惯例。艾尔曼的书是其中的一本。

《从义理学到考证学》原是艾尔曼的博士论文，经修改而成书。在美国，读一个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如果从大学本科算起，一般至少得寒窗十年。在博士供过于求的今日，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如果想在大学内求得一较为固定的教学职位，非得有著作不可。将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出版，便成了有意在学术界立足的年青学者们的必经之路；而由博士论文而成的著作往往不仅是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书，也成了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求职必须具备的敲门砖。在激烈的竞争下，能将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出版者是为数不多的；书出之后，能赢得声誉者更属寥寥。艾尔曼此书属于少数几本获得学术界好评的著作。从美国几家有声望的杂志如《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纽约评论》（The New York Review）等发表的有关书评来看，尽管诸家对艾尔曼此书评论的角度各异，但一致认为这是一本史料翔实，见解新颖，言人之未言的有份量的学术著作。

"新"，几乎是美国学术界的生命。在美国，一个学者不可能关起门来作研究。在他（她）动笔写作以前，必得了解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内已经作了些什么工作；他（她）必得估量这些已有的研究，论其成败得失，然后明确指出自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什么新的贡献，因此"新"便成了学术研究的要素。所谓"新"本是相对而言的，今日被视为新鲜的事物，若干时日后或许就变得陈旧了，因此"新"意味着对前人研究的挑战；"新"在这

里又是一个“横”向的概念，即它是与今日的同行们的研究相比较而言的。这种追求“新”的时尚，大约是一个信息化了的和商业化了的社会在学术界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它实质上反映了一种“学术市场”的价值观。

艾尔曼既是一位美国学者，他的著作当然要提出新的东西才能在那里立足。综合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我认为艾尔曼的研究在三个方面具有新意。其一是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结合；其二是学术史（或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其三是第一次为西方学术界提供了清代学术史的具体入微的图景。

一、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结合

虽然不完全相同，国外所称“大历史”（Macrohistory）颇近似乎国内的“通史”；国外所称“小历史”（Microhistory）则类似于国内的“地方史”。很明显，前者偏重于大而全，后者倾向于小而专；两者如何结合，确实是个难题，这似乎是一个鱼与熊掌的选择，难以兼得。《从义理学到考证学》在这方面算是做到相当精妙确当的。此书的主题为清代的考证学。艾尔曼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清代的考证学的盛行并非系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学者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不得已而逃避现实，钻入故纸堆中，而是宋明以来儒家的“汉学”和“宋学”之争在清代的继续。

艾尔曼认为，所谓“汉学”和“宋学”之争在明朝后半期已难解难分，清代考证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它反映了当时的学者企图摆脱程朱理学（或称“新儒学”），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在恢复正统的汉学。清代考证学者认为，宋明儒生通过朱熹、王阳明来了解儒学正统是走入歧途，因为朱、王的儒学中掺杂了许多道家与佛教的思想，并非真正的儒学正统。考证学者们想要通过对原始经典的考证来摆脱统治了学术思想界数百年的宋明理学。

艾尔曼指出，正因为如此，清代的考证学并非单纯的求学问的现象。虽然考证学家的主要工作在于辨古书之真伪，析古训之定义，以及求古音、古字之来历，但他们并非完全为考证而考证。考证学者中，颇不乏寓哲理于考据中之人。例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即试图通过考证《孟子》来驳斥朱熹对于儒学核心“仁”的解释，从而否定宋明以来的理学正统。又如，李塨(1659—1733）的《论语传注问》通过考证“为仁由己”来抗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诠释。阮元、焦循在他们各自的考证学著作中也都有类似的倾向。艾尔曼认为，这说明考证学本身是有思想和哲学上的倾向的，并非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事实上，从清代的理学维护者们对考证学的攻击也可以反证考证学的哲学内容，如戴震的学说遭到桐城派的批评。桐城派主要人物方东树在其《汉学商兑》中即谴责考证学家对“仁”的解释违反了儒家的道德精神。这种争论反映了考据学的哲学内涵，也说明它是宋明以来“汉学”和“宋学”之争在清代的继续。

艾尔曼还进一步指出，清末儒家思想的动摇，不只是因为西方思想的侵入而产生的。考证学对理学的批判是儒家思想动摇的初步。理学既然作为儒家正统统治了学术思想界数百年，它的根基一旦在考证学的攻击下动摇了，则整个儒家思想便产生了裂缝。艾尔曼认为在清末民初谭嗣同、刘师培等人的著作中还可以发现不少乾嘉考证学的影响。他还从研究清代考证学中有关自然科学的著述（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中阐发这样的观点：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相比，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冲击”所产生的影响是次要的。②

上述这些观点都是出自清代思想史中的一些大的课题，或者说它们都出自“大历史”。艾尔曼治学的特点在于他将这些大课题纳入具体的小范围中去研究，这样引申出来的结论便较有深度。艾尔曼选择了清代的江南及其附近地区作为他的研究重点，特别注重于扬州府、苏州府、常州府和杭州府一带，这是有其理由的。明清江南地区不仅是众所周知的“人文荟萃”之地，它更是清代考证学的大本营，乾嘉学派中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两大支都出自这一地区。但是，艾尔曼的研究不只限于对主要学者及其著作的阐述，他更从一些一般研究忽视的角度去看问题，诸如江南各地书院的兴起及其在教育和学术界的地位和作用，明清江浙一带公私藏书楼的藏书情况及其在学者们的考证研究中的作用，印刷业和印刷技术对学术的影响，一些大部头书籍如《四库全书》、《皇清经解》等的编纂经过（尤其着重分析其源起和官方及半官方学者的赞助情况），清代学者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互相往来和交流学术的情况，等等。通过这些比较细致和具体的研究，艾尔曼不仅为治明清学术史和思想史者提供了一些以前鲜为人知的史实，同时也为他自己的立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社会史和思想学术史的结合

将社会史的研究引入思想学术史研究的范围，是艾尔曼治学的另一特点。传统的思想学术史研究一般只注意学者及其著作，很少有人将思想家、学者的家庭渊源、地域环境、生活景况等作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来加以分析的，艾尔曼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开一先河。他在《从义理学到考证学》中对考证学家们的社会背景作了专门研究。例如，他将阮元(1764—1849)主持汇刻的《皇清经解》中所收著作的七十五名作者的出身经历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并从量化中求分析。艾尔曼指出，在有资料可循的这些学者中，以地理背景而言，87％的学者出生于江南地区，江南以外的仅占13％；以家庭出身而言，87％的作者出身于文人学者家庭，只有8％的作者出身于商人家庭；以本人地位而言，92％的作者拥有功名，其中53％是进士。约有三分之一的学者只是低级功名的获得者，这说明在清代下层知识分子通过在学术上的努力还是可能进入上层学术界的，这在十七世纪时尤为明显。艾尔曼解释说，这可能是由于清初汉人中的一些上层知识分子不愿与当局者合作，较少著述，因而使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但从整体上看，清代考证学家与宋明时代的新儒学学者似属同一社会阶层的人物。

艾尔曼分析说，事实上商人家庭出身的学者的比例要比上述统计的要高，只是由于传统的重儒轻商观念，一些传记的作者有意将传主的家庭背景加以渲染，其实考证学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都出身于商人家庭。例如，阎若璩出身于盐商家庭，但他的许多传记对此都避而不谈。又如，阮元的外祖父是扬州的盐商，而阮元的官方传记中对此也讳莫如深，如此等等。考证学者中的另一巨擘戴震出身于布商家庭。艾尔曼指出，这反映了清代江南一带商人（尤其是盐商）致富后，让其子弟进入学术界的一般趋势，而当时的学术界便是考证学界。

艾尔曼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清代中期的考证学的兴盛与商人的资助有一定的关系。《皇清经解》的作者中有十五名出身于以盐商巨贾众多而著称的扬州府，为各地之首，似非偶然。此外，一些有地位的上层官僚如赵翼（1727—1814）、王鸣盛（1722—1798）、钱大昕（1728—1804）等虽在官场上占有高位，其真正兴趣却始终在考据，而他们的地位使他们

有能力赞助和推动考据。艾尔曼由此提出清代考证学的兴起不仅是一个学术界的现象，同时也得助于当时的社会经济乃至社会风尚。

这种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艾尔曼即将出版的新作《经典，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的常州今文经学派》(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艾尔曼在此书中集中研究了清代常州的今文经学派。据他自己说，他对此有兴趣由来已久，他几次到中国作研究也与常州学派有关。该书集中讨论常州的庄、刘两大家族及其在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形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中国（尤其是南方）地方上的家族制度对学术思想是否有重大的影响？艾尔曼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利用现存于中国和日本等地的珍贵的地方志和族谱资料，详细分析了清代常州的地方家族和它们之间的交错着的学术和婚姻关系。艾尔曼指出，在清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形成，与常州地方上庄、刘两大家族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联姻有直接关系。仅清代的常州庄氏家族中就出了二十九个进士、九个翰林。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形成不仅是因为这一学派的开创人庄存与、刘逢禄之间的师承关系，而且是庄、刘两族频繁联姻的结果。这种从宗族到学派的联系，也反映了清代士绅阶级希望通过宗族和学术的结合去寻求政治上的影响力。艾尔曼此项富有新意的探索一定会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兴趣。

三、以“细”见长

由于艾尔曼善于将大历史与小历史相结合，善于将社会史研究引入思想学术史研究的范围，他便有可能为西方学术界提供明清思想学术史的“细部放大”。《从义理学到考证学》是英语世界中第一部系统论述清代江南地区学术思想的著作。耶鲁大学的清史专家史敬思（Jonathan Spence）在他的书评中写道：“艾尔曼先生将十八专纪的思想家置于一个丰富多彩的环境中加以考察。通过这些技巧娴熟、见解独到的篇章，我们不仅知道了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而且知道了这些思想在哪里产生、如何产生的：我们知道了他们的书院和教育，他们的经济背景（许多思想家出身于商人家庭），他们的藏书楼，他们的日记和他们的社会习俗。”③夏威夷大学的郭教授（D、W、Y、KWOK）评论说：“艾尔曼系统地审视了‘学术的社会学’：学者们的社会出身，官方和半官方的资助，书院，文人的作用及其变化，藏书楼，印刷与出版，参考资料和考证，以及知识的分层。此外，艾尔曼还阐明了当时学术交往的方法：在注释经籍中分享研究的技术；资料的使用；学术上的合作，通信和会议；研究上的反复参证；选课的取舍和研究中的成就感。”④布郎大学的格里德（Jerome B.Grieder）教授认为艾尔曼的这一著作“不仅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历史，它也是一部蕴育了考证学派的思想和社会文化史。”⑤这些评论都强调了艾尔曼研究这些课题的具体入微，可用一“细”字来概括。

细致的描述在艾尔曼的书中俯拾皆是。例如，考证学的盛行离不开书籍的印刷和流通，艾尔曼考察了为何雕版印刷在清代最为盛行，而相对进步的活版印刷反见稀少。他认为这是因为前者成本低，制版后差错少，易于保存；而后者成本高，易出差错，又不容易保藏。艾尔曼又考察了北京琉璃厂和江南一带的书市，叙述了这些书市如何在珍本书籍的保存和流通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连阮元和朝鲜学者金正喜（1786—1856）各自为保存濒于绝版的经籍而

作的努力以及两人之间的交往都有详细的记载。艾尔曼还将考证学著作中有关天文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的论述和明清耶稣会士带入中国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相参照，认为耶稣会士之所以未能在科学方面根本性地影响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考证学家们从中国的古代经典中找到更具说服力的论述，从而怀疑西方科学的准确性。这些描述当然都是服务于研究清代考证学这个主题的。一般思想学术史的研究者只注意研究学者及其著作，往往忽视较为琐碎的背景的研究。其实学者离不开他的生活环境（不仅是大的政治环境，更是具体的个人生活环境），艾尔曼的这类研究，可使思想学术史的领域更为宽广，而其内容更为充实。

学术研究上的细致入微不仅是方法论的问题，它需要大量艰苦的工作。艾尔曼属于治学谨严、孜孜不倦的这一类学者，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上。他的夫人蔡素娥女士（Sarah Elmcn）曾风趣地说："我本以为只有中国人中才有埋头读经的书生，原来在美国人中也有！"用艾尔曼自己的话说，他是孔夫子所称"困而知之"一类的人物，因而他为自己的书斋取了一个寓意颇深的名字："困学斋"。

这里附带谈一下艾尔曼的语言能力。一般说来，现在年青一代的美国的中国史专家的语言能力都比他们的老师强。五、六十年代美国的中国史教授中（除华裔外）能阅读中文的并不很多，不少学者需要倚靠华裔助手才能用中文的原始资料作研究。而现在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中能直接利用中文资料作学术研究的已为数不少。艾尔曼则属于其中语言能力较强的一位。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据他自己说，是得益于他曾分别在东京和台北的斯丹福中心学习的经历。他大学毕业后又曾在泰国工作过三年，因而他又能泰语。我曾与他一起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和摩门教会的族谱图书馆翻阅那里的清代殿试试卷，颇惊讶于他的古汉语阅读能力。那些佶屈聱牙的八股文，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能力读通的已不多见，艾尔曼却都能读通，还往往知其典故来历。这种特长，当然增强了他作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能力，也使他能比较容易地与美国以外的各国学者交往。

一九八九年六月，艾尔曼与加拿大教授渥德赛（Alexander Woodside）一起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教育与社会"的学术讨论会。该会在美国加州的圣巴巴拉城举行，颇称成功。艾尔曼在会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中华帝国晚期的教育、社会和科举考试"和"明清时代的儒学科举考试和帝国的意识形态"。这两篇论文的题目显示了艾尔曼今后的研究方向。清代的教育，从地方上的书院到京城的殿试，将是艾尔曼研究的重点。可以预期，将社会史、地方史与清代教育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仍将是艾尔曼正在从事的清史研究的主要特色。

---

① 黄宗智曾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中国明清及近现代史研究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五十年代的官方史和人物思想传记研究；第二代是六十年代结合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第三代是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和地方史研究。见其所作"三十年代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第1—16页。

② 自从邓嗣禹和费正清(J.K.Fairbank)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考察，1839—1923》一书后，长期以来，西方"冲击"(Impact)和中国对这种冲击的"反应"(Reoponse)成了美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在七十年代后已被打破。近年来学者们更倾向于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变迁的根源。艾尔曼也从清代学术史的角度对"冲击一反应"模式提出异议。

③ 《纽约评论》，1986年1月16日。

④ 《美国历史评论》，第91卷第3期。

⑤ 《亚洲研究》，第46卷第2期。